

綜論「城邦」 的是是非非

近幾年來，本港掀起了一股關於「城邦」話題的討論。簡言之，就是有一些文化評論者認為香港是一個類似於古希臘文化歷史中的城邦，應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獨特性甚至獨立性，與祖國內地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離與區間。那麼，該如何看待這種文化思潮、怎樣把握正確的文化認同與方向，這是本次專題要討論的問題。與此同時，本報亦訪問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導師、區議員郭錦鴻老師，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些他的看法與意見。

文：陳匯

「城邦」論混淆文化源流

「城邦」論是近年來在本港引起較大爭議的一種文化思潮，是由文化評論人士提出的。他們認為，香港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已經發展出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民眾性格或心理特質，因此，香港應當成為類似於古希臘那樣的一個城邦，享有完全意義上的自主性，並且與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以及當下現實意境中的中國內地，拉開距離，以保持香港的本土特色，強化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形成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香港主體意識和社會結構。

郭錦鴻老師認為，「城邦」論的興起，實際上是一種將自我隔離於中國文化的做法與思維。這種文化儀式犯了一個前提性的錯誤，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源流是不同的。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家國文化，是一種建立在血緣、宗族基礎上的文化體系。其次，中國是一種大陸文明，是一種在農耕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架構。而古希臘的歐洲文化，是建立在海洋文明的基礎上的。因為古希臘的資源特別少，民眾在海邊長大，流動性特別大，哪個地方的資源集中，他們就向哪裡遷移。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海洋文明的流動性與大陸文明的固定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差異集中體現在資源的分配模式上。古希臘進而造就了民主體制，以民主化的方式保證資源的分配，這就是城邦制度的源流。但是中國的古代文明是建立在宗族上的，輩分的高低決定權柄的大小。因此，將中國的家國文化與西方的城邦文化加以融合，是一種非常幼稚和錯誤的做法，也忽略了這種文明差異背後不同的社會體制。

郭錦鴻老師認為，不能夠以古希臘城邦的民主化制度，將城邦等同於可以脫離母體國家而得以自主的民主體系。郭錦鴻進一步解釋，在本港的一些人心目中，有些人對中國內地有潛意識的輕視或者敵視，他們凡事都覺得內地與自己是敵對的，從而形成了一種



■郭老師認為，城邦論是對香港文化的誤讀。

刻板的印象，這一類人打從心底看不起中國文化，也看不起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甚至將這一切遷怒於來自內地的香港新移民階層，認為他們是破壞自身身份的細胞。有些持激進立場的社會運動人士甚至認為，是中國內地基於民族主義不能夠失去香港，而香港並不怕失去內地，這種想法其實是一廂情願的。久而久之，這種想法就成為一種分離意識，並且成為割裂勢力的隱動力量。

文化傳承不能被割裂

但郭錦鴻老師指出，事實上內地與香港是在同一個文化圈運作的，雖然二者在歷史發展的際遇上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大家擁有的是一個共同的歷史傳承與文化體系，擁有共同的血緣。香港完全不必因為內地幾十年的歷史發展，就對中國文化產生隔離或者疏離。文化，只有變與不變，沒有對與不對。即便是不認同這樣的文化，但也不可以摒棄自身的文化



■早前，香港人因兩地種種矛盾，產生強烈的反抗情緒。

特質。例如一對父子，兒子對父親的處事方式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這是源於二人成長背景的不同，或者可以看作是代溝，但這些無法改變雙方是一家人的事實。

郭錦鴻進而指出，如果因為單純地不認同對方，就摒棄家庭觀念，就要割裂關係，這反映了一部分人將家國天下的觀念放在了一個很低很低的層次上，而把自身獨立抽離，並放到一個很高的層次，形成了高下分明的對立格局。郭錦鴻認為，近年來，包括「城邦」論、「次主權」等一些概念層出不窮，對年輕一代人培養正確的思維產生了較為負面的影響，讓年輕人誤以為「反對政府就是獨立思維」，將大量的時間浪費在這些並無實際意義的概念爭論上，這對香港的未來並不好。

旗幟意味着取代

近年來，香港的社會運動或是反對派舉行的大型政治活動中，會有一群年輕人舉着港英時代的龍獅旗，形象很突出。這種現象曾經引起許多愛國人士的憂慮，也曾是社會輿論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根據這樣的現象，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也提出應當進行系統化的國民教育，以強化香港年輕一代人的國家認同。

但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這些高舉龍獅旗的年輕人，其中大多數的殖民地經驗是非常模糊的，他



■內地來香港的遊客也有可能被仇視。

們對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生活實際上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這與單純戀舊的殖民地遺老群體有着很大的分別。既然沒有深刻的殖民經驗，這些人為何會高舉殖民時代的龍獅旗呢？

針對這一現象，郭錦鴻說，旗幟實際上是一種動員方式。在網絡化的時代中，人們往往依靠網絡文字作為凝聚的工具。大家在臉書上發一篇文章或者寫一則帖子，然後轉發到好友中，就可以成為一種動員工具。而旗幟動員，實則是一種非常傳統的動員方式。為何這麼說呢？因為在傳統的政治哲學中，旗幟代表的是一種符號，一種認同的工具與信仰的價值。用旗幟的方式來進行動員，實際上就是代表着對現行的一切建制表達不滿，就是要進行一種取代——以所謂的香港自立來取代現行的特區架構。所以郭錦鴻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郭錦鴻認為，要消除這樣的現象，確實需要加強對年輕人的國家認同與民族文化教育，需要讓年輕一代人能夠以正面和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與文化，能夠培養起香港人正確、多元的民族自豪感。以學校舉行的升國旗儀式為例，升旗儀式的舉行——無論是升國旗還是唱國歌，都不能夠以形式化或者儀式化的工作來進行，應該讓每一次升旗儀式都能夠起到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承，讓每一次升旗儀式變得有意義、有價值。



■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車公廟。



■中國傳統信仰：黃大仙

走出「城邦」意識的誤區

郭錦鴻打了一個比喻——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屋子。中國共有三十四個行政區，其中有二十三個是省，五個是自治區，4個直轄市剩下的兩個是特別行政區。具體而言，在一個很大的屋子裡面有三十四個房間。在這些房間中，二十三個是標準間，四間是與大廳直接相連的直轄房間，五間房子因為自身的住客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因而被賦予自理房間的權力。而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兩間房，因為曾經被人打劫，曾經劃分給另一個大的屋子，如今又歸還了這間大屋子。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或許是與這間屋子中其他房間相分離得太久，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兩間房中的住客對於房子中的其他住戶失去了安全感，對這一居住單位中的文化以及文化轉變感到非常模糊，並開始起疑。正是考慮到了這種感受，屋子的主人

在收回這兩間房之後，賦予了這兩間房高度自治的權力。在這種框架下，你可以對整個單位以及單位中的各個房間的文化不認同，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文化，但因為大家有共同的歷史，因此即便是自己的文化，也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度自治的含義就是，自己打理房間，有任何需要，其他房間或者是屋子的主人都會盡力幫助，但大前提就是這兩個房間是這個屋子的一部分，是屬於這個單位的。一間屋子中的人，原本就是一家人，因為歷史的緣故，導致自己打理房間。但是無論怎樣打理，都必須承認一點——大家都是家人這個事實，這個事實是歷史賦予的，也是這個家庭原本的本質。

房間內的房客，對於選舉房間主人的遊戲規則，或許有分歧，最初或許還無法取得共識。但是為了房間的整體利益，儘管

有分歧，但是不會出現太大的自我消耗，不會對自己歸屬感有疑惑。房客不能夠因為自己不喜歡屋子中其餘單位的房客，認定他者是劣質的，認為自己的房間可以脫離整個屋子而單獨存在，這種想



■內地自由行旅客。

法是非常錯誤的。房子中共同使用的客廳，其實就是香港人與內地人共同分享的歷史文化傳承，或者說是國家認同。而持有城邦意識的人所宣揚的主張，就好比要在自己的房間中再新造一個廳出來，破壞了原有的屋宇結構，這是徒勞和無用的。這將會帶來一種極為尷尬的角色與情感。因此，城邦意識的背後，實際上是對自我屬性的一種否定。到了那時，大家就會陷入「我是誰」的巨大困惑中。

我們是鮮明地反對城邦意識，並不是反對香港人對本土的文化進行保護與傳承，

也不是妨礙香港進一步走向現代化與民主化。反對城邦意識，是對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進行正本清源的梳理與注解，是對香港人的國家認同進行正確的宣導與培育。

鄉土意識不是分離意識，鄉土意識更不是排外意識。以本港社會的新移民階層為例，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為香港社會的發展作出了突出和卓越的貢獻。他們做着全香港最累最苦的活，但是卻被持有城邦意識的人視為是永遠的外來者。這是一種法西斯的思維，也是現代文明社會所不能夠容忍的思維。我們反對城邦意識，正是為了下一代的福祉與幸福，也是為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和諧以及民族文化的復興與傳承。